

间谍与战争

JIANDIE YU ZHANZHENG

ZHONGGUO GUDAI JUNSHI JIANDIE JIANSHI

于彦周 编著

中国古代军事间谍简史

■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激敌激敌！无所不用间也。



时事出版社

间谍与战争



中国古代军事间谍简史

于彦周◎编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谍与战争：中国古代军事间谍简史/于彦周编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ISBN 7-80009-906-7

I. 间… II. 于… III. 间谍—情报活动—军事史—
中国—古代 IV. 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785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spublish.net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字数：299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80 元

作者简介

于彦周，农家子弟，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生于安徽砀山。大学讲师，自号治易斋主人，酷爱中华传统文化，以探求易理为己任，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修身、治学座右铭。现正攻读博士学位。



序

战争是间谍的温床，间谍是战争的产儿，战争历来离不开用间，这是经中外战争史实反复证明且颠扑不破的真理。间谍活动是战争双方倾力角逐的重要方面和手段，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是战争谋略较量中最隐蔽、最神秘的领域，是任何样式的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国际间谍界公认为业内圣经的《孙子·用间》篇有云：“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每次血与火的冲突对抗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用间踪迹。可令人遗憾的是，翻开诸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战争史，很难发现对用间行谍的正面描述，即使有也是只语片言地一笔带过。这可能是用间行谍有悖于讲求“堂堂之阵”的正统经学的缘故吧。用间行谍无异于鸡鸣狗盗式的诡诈与不义，如若从之而又公诸于世，岂不背叛“只做不说”的传统间谍观？于是乎，用间行谍俨然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中“被遗忘的领域”。



尽管如此，秉持史德的诸兵书、史传作者仍以种种方式突破了传统间谍观的羁绊，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古代战争中用间行谍的案例。如《孙子·用间》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论述间谍理论的著作，它本身就是对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间谍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有“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说。再如，唐代史学家杜佑花费 35 年心血所编著的《通典》，其中“间谍”篇就列举了从春秋到唐代的一些重大间谍案例，以说明间谍在军事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而最值得称道的是清代朱逢甲先生所著的《间书》，该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古代间谍史书，它依照《孙子·用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上起夏代下迄明清的间谍活动进行了概略性的论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一些有志于中国古代间谍史研究的同志相继推出了《中国古代间谍史》、《中国古代用间百例》、《中国间谍全书》、《谍海风云四千年》、《中国古代间谍史话》等著作。但因编撰出发点不同，对间谍概念的认识与把握也不尽相同，所以成书内容出入较大。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间谍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为战争服务的，要么是为谋取战争的胜利，要么是谋求减少甚至避免战争的危害。本书旨在依托中国古代战争历史平台，沿循其发展脉络，追溯中国古代间谍活动史，凸显“知”与“战”之密切关系，以有效反映及揭示出中国古代战争史传统撰写中“被遗忘的一面”，从灿烂多彩的中国古代战争历史长河中，实事求是地勾勒和描绘出一幅幅间谍斗争的斑斓画卷。本书行文力求做到简洁、准确及言简意赅。在保证史料编撰“客观、求实”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为增加些许通俗性、可读性，本书对其中一些非关键素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渲染。



鉴古可以知今。“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正如塞万提斯在其《堂·吉珂德》中所言：“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了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历史并不是一些人眼中的“老古董”，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就是现实所需理论的根本渊源。它能够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目光来审视人类生存的时间与空间，而不至成为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的庸碌之辈。因此，笔者希望能尽自己绵薄之力，能以自己的管孔之见来引发大家对间谍史学的理性思考，并给广大军事、外交、公安及国家安全等战线上的同志献上一部富有参考借鉴价值的间谍史学读物。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加之提笔忐忑，所以偏颇、错谬及不够精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同仁不吝赐教。

作者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八日



前 言

间谍鉴源及相关思辨

间谍一词乍听神奇幽秘，再加上间谍文学及影视作品的肆意渲染，人们自然会对间谍活动及间谍人员产生无穷的想象：间谍活动神奇诡秘、高深莫测；间谍人员往往三头六臂、神通广大、为所欲为且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所不得。结果导致人们对间谍的认识往往是鱼目混珠、褒贬各异、论争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匡清间谍一词的义界，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有着非常重要的认知价值。

一、何谓间谍：对间谍 一词的文字学考释

间 “间”原作“閒”。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门部》解释：“閒，隙也，从门从月，会意、示形。”徐锴曰：“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意思是夜晚两扇门虽已紧闭，但月光仍可透过门板之间细微的缝隙投射进来。意谓“间”语源上即具缝隙、间隙之义。《辞源》称：“事之有隙可寻者曰间。”这种“隙”是客观存在的，而对“隙”的主观运用即“间”，则既可以表现为情报认知意义上的窥探，也可以



表现为谋略运用意义上的离间、策反及破坏等，且谋略运用是以情报认知为基础和前提的。《孙子》全书共出现 35 个间字，许多学者认为这 35 个间字均只指“探知敌情”，至于“离间”等意则为后人曲解、强解。如于鬯在其《香草续校书》中称，把“间”理解为“离间”等义并非孙武本意。再如日本《孙子》研究专家服部千春在其《孙子兵法校解·通释篇》中讲：“间是指往来于敌国，窥探敌情，或者乘敌方的空隙，打入敌方内部获取敌国情报的人。”其实以上这些都是对孙武用间思想的片面理解，《孙子·用间》只是强调“先知”或“知敌之情”对“动而胜人”的极端重要意义，视搜集情报为“间”工作的必要基础和首要职能，但在用间类别、用间原则、用间纪律等核心理论上并没有排除离间、策反等谋略行为的适用性。

谍 谍字最早见于《左传·哀公元年》中的“少康使女艾谍浇”。谍字从言旁，《玉篇》言部解为“谍，伺也”。《说文解字·言部》把谍释为“军中反间也”。唐代孔颖达解其“谓诈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报其主。故此训谍为伺，而兵书谓之反间也”。《辞源》解释说：“谍，伺也，伺候敌人之间隙以反报其主者曰谍。”由此可见，谍即指乘敌之“隙”刺探敌情的情报行为，亦可用作名词，指称乘敌之“隙”刺探敌情者。

间谍 由以上考释可以看出，间的义界大于谍的义界，因为它包容内涵谍的义界。如单从情报认知意义上讲，两者的义集是重合的，且相比较而言，谍字的情报意蕴更纯，情报色彩更浓，间字反而显得并非那样集中饱满。《大戴礼记·千乘上》中所讲的“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其意即在于此。有人把这句话生硬地解为“大的窃密活动叫谍，小的窃密活动叫间”，确是有失理解的深透。而间谍两字合用首见于《吴起兵法·应变第五》中的“急行间谍，以观其虑”。而间谍一词



的义界则因间与谍两字义界的包容与被包容的特殊关系，而呈现出不稳定的游离形态，有时只聚集在谍字的义界内，指称“探知敌情”或“探知敌情”者；而有时又会泛盖间字的义界，不仅可指称“探知敌情”或“探知敌情”者，还具有“离间”、“策反”等谋略范畴内的义项。为消弭间谍这种不稳定的义界状态，后来人们索性把间的义界人为地缩小为原义界除掉谍字义界之外的部分，即只表示“离间”、“策反”、“破坏”等义项。如《唐律疏议》中讲：“间谓往来，谍谓觐候。”而间谍一词的义界也因此而固定表现为原“间”字的义界。

在具体间谍实践中，“间”与“谍”关系非常密切，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相互依存。“谍”之于“间”来讲，对方客观“间隙”的发现，靠的主要是“谍”这一情报手段；对敌方成功实施的离间、策反等“间”行为，离不开“谍”的先期及过程中不间断的情报支持。“间”之于“谍”来讲，无“间”不成“谍”，任何成功的“谍”在实质上都离不开不同程度的“策反”或“离间”活动。只不过有些间谍活动以秘密获取情报为主要目的，可称之为“谍”；而有些间谍活动则以离间、策反及破坏等为主要目的，可称之为“间”。但在具体间谍活动过程中，“间”可以因已获取或可获取所需秘密情报而转化为“谍”；“谍”可以因对象职位的变化、活动阶段的迁移等转化为“间”。所以，“间”与“谍”两者孪生，密不可分。

二、现代情报学视野之中的“间谍”

依现代情报学学理分析，间即“间隙”，即对方安全保密



网络之中的“百密一疏”。这种严加防范之中的间隙可以明显呈现，但更多是潜在或隐性的，需要己方去积极地探寻和发现。这种间隙可以表现为对方内部某些关键职岗人员的人性弱点，如贪财、好色、嫉妒、对现状不满等等；也可以表现为对方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如《国家安全法》、《移民法》、《保密法》等法律条文及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保密制度等客观存在着的漏洞；也可以表现为对方政府及国民因陶醉于己方友善而逐渐丧失的安全警惕等等。只要有间隙，对方就绝不是攻不破的堡垒，就绝不是钢板一块，己方也就有可能乘隙而入。

对方间隙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悄然深入敌隙开展秘密活动的性质，那就要看指挥者的使用意图了。但无论如何，秘密搜集情报当属第一要务，这就是“谍”。因为己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战争迷雾”问题，对方从认知上讲是一个黑箱，主动认知的外部探测方法很多，如积极收集并根据该黑箱的大量辐射信息指标，来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从而达成解密黑箱的目的。但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积极发现对方的间隙，并伺机打入其内部实施秘密侦察，以获取其内幕核心机密性情报。这正如《孙子·用间》所言：“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一旦“认知黑箱”问题解决了，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也可充分利用对方间隙积极扩大进攻成果，从事离间、策反和破坏等“间”行为。这在战争时期表现尤甚，因为一切均要服从服务于夺取战争胜利这一最高利益，利用敌方间隙大胆而缜密地开展离间、策反和破坏等间谍谋略行动，这样可以有效地削弱敌方战争实力及战争意志，甚至可以“兵不血刃”地祛敌，赢得战争胜利，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理想境界。这对战争指挥者来讲，何乐而不为？这些虽离“谍”甚



远，但与“谍”同属乘敌之隙行为，都与“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往往与“谍”有着共同的组织指挥机关及行为主体。所以，离间、策反及破坏等通常也被划入间谍的范畴。在国际间谍实践中，美国、前苏联、以色列等国间谍机关在做好谍报工作的同时，均十分重视开展以谍报工作为基础和前提的间谍谋略行动。这正如比埃尔·阿莱姆在其《古今谍海秘闻》中所言：“间谍机构同样遵循一条现代规律，就是每个行业都在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药剂师兼营指甲锉，面包师也出售口香糖，屠户也经营土豆片。所有这些经营都同他们的初衷相去甚远。间谍机构今天也进行政治活动、搞准军事行动、搞破坏等。看起来，这些活动同搜集情报有天壤之别，甚至是驴唇不对马嘴。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如出一辙，即同属于秘密行动。”

三、间谍称谓的泛化与丑化

间谍原为动词。不过在人们日常语言中，“间谍”呈现出更多的是其名词属性，即出于某种斗争的需要，深入侦察对象内部秘密从事情报搜集、离间及破坏等特殊任务的人员。在概念内涵上与英文中的“SPY”并不对等，“SPY”的词根为“SP”，意为“发现、窥视”等，在义界上只能相当于“谍”字。1907年国际法《海牙公约》中规定：“在交战者一方的地带内，通过隐蔽的行动或虚构的口实，以收集或企图收集情报通知另一方者为间谍。”但即使这样，国人在翻译“SPY PLANE”、“SPY SHIP”、“SPY SATELLITE”等西方术语时却还生硬操作，把它们直译作“间谍飞机”、“间谍船”及“间



谍卫星”等，使人往往因此而很容易把间谍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把无线电技术侦察、战场侦察、航天侦察等也误认为是间谍工作。其实像“SPY PLANE”之类术语是西方情报界“技术至上”思想的真实反映，它强调的是此类侦察平台的功用像谍报人员一样，可以用来秘密搜集敌方的情报。为避免产生歧义大可意译为“情报飞机”等，没必要借间谍一词来故弄神秘。此外，随着社会各行业内部及内外相互竞争态势的日益加剧，为迎合猎奇和神秘化等文化心理的需要，人们通常还喜欢把一些新兴或传统的情报活动称为间谍活动，不论其是否具有充足的秘密属性。于是乎，其行为者自然会被冠以“文化间谍”、“商业间谍”、“足球间谍”等等花哨的名称，以博眼球。

另外，人们通常出于对自己国家、民族乃至集团安全利益的捍卫及对外防范意识，普遍对间谍一词持有反对和敌视态度，主观上很易对这种“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赋予“鸡鸣狗盗、男盗女娼、卑鄙无耻、阴险诡诈”等贬义，把它等同于“特务”、“破坏分子”等概念。其实，这一切均是对“间谍”的误解。“间谍”就是一把斗争的利刃，可以用来实施自卫，也可以用来寻衅滋事，关键是看刀子掌握在谁手中以及使用意图何在。

四、 谍报 · 用间 · 间谍谋略行动

谍报就是运用间谍获取情报，通常是指深入敌后纵深秘密获取机密情报的非武装人力侦察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谍报是情报学范畴内的概念。用间即对间谍人员及手段的运用，其行为主体是间谍机关指导（领导）人员甚至可以是国家、军队的最



高决策者或统帅，他们指导（领导）间谍从事情报搜集、离间等间谍活动，以期为己方战略决策及战略实施提供良好的情报保障及活力对抗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用间是战略学及谋略学范畴内的概念。另外，从学科学上考察，谍报学是情报学与间谍学的交叉学科，是间谍理论在情报学科内的有效迁移。所以，谍报学在接受情报学学理规范的同时，应切实尊重自己的父本学科——间谍学，从中寻求自身发生、发展的原始动力及寻求解决理论建构与实践亟需之间矛盾的根本出路。

和平时期，国际斗争形势相对缓和，斗争强度相对较弱，斗争形态往往表现为公开或秘密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内的角逐或竞争。为夺取国际斗争主动权、争占发展先机及谋求认知优势等，战略决策者一般只把本国（集团）间谍机构用作把握外部情势的情报认知工具，要求它们积极开展对外谍报工作，搜集并提供所需的政治、外交、军事及科技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且情报需求通常并不是特别迫切、特别具体、特别深入、特别广泛。一旦临战或转入战时状态，为保证夺取战争胜利这一最高利益，战争指挥者除赋予本国（集团）间谍机构更迫切、更具体、更深入、更艰巨的情报搜集任务外，还通常会把间谍机构所具有的敌后优势资源直接纳入战略力量体系中，赋予其策反、离间及破坏、引导打击等等重要任务。这是间谍工作的基本内涵，亦是国际间谍界的惯常做法。

用间即对间谍人员和手段的运用，用间不仅可以行谍获情，亦可以离间祛敌等。用间是活力对抗中的谋略手段，而谍报则是对敌认知过程中的侦察手段，两者行为主体迥异，学科归属不同，但人们往往把用间简单理解为谍报。如有些学者把《孙子·用间》中的“用间”解为“运用间谍获取敌情”。其实《孙子·用间》是孙武站在战略学及谋略学的高度，对其前的



用间实践进行的理性总结，是对其后的战争筹划、指挥者在开展间谍活动方面所提出的劝导与规诫。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用间》应属高级间谍参谋学或指挥学性质的理论著述。我们大可以将其视为谍报理论的源头，甚至可以将其顶礼膜拜为鼻祖先宗，但切不可像国内外有些学者那样，将《孙子·用间》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古典谍报学著作，并用现代情报学概念来诠注其理论内涵。

间谍谋略行动即指在活力对抗中，除以正用“谍”侦知敌情外，以奇用“间”对敌所开展的离间、策反及破坏等项活动。传统意义上的谍报工作主要只是通过自己独特的组织序列及工作程式，为己方指挥者实施决策提供认知优势，通过指挥者对所获谍息情报的理解与运用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它也只能发挥情报保障职能。而间谍谋略行动则是指挥者对间谍资源的直接掌握及运用，它已突破“搜集并提供谍息情报——指挥决策者判断及运用——实现战略目的”这一传统链条的束缚，使间谍从情报认知手段直接跃升为一种灵便、有力的战略手段，以离间、策反及破坏等形式的对敌秘密行动来直接谋求实现某种战略目的。

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战争目的一般非常有限，战略、战役及战术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且“堂堂之阵”的战争耗费惊人。如能在卓有成效的谍报工作基础之上，以“间谍”奇兵深入敌后，秘密策反敌军将领，扰乱敌民心士气，实施对有关战略目标的直接破坏等等，可以直接或有力配合既定战略目的的实现，那么，间谍谋略行动将是指挥者最直接、最理智、最经济的选择手段。美国间谍部门在伊拉克战争中秘密策反伊高官、配合实施“斩首行动”等精彩之作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目 录

前言：间谍鉴源及相关思辨	1
第一章 对史前间谍活动的追忆	1
一、间谍活动起源的理论之争	3
二、对中国史前社会的概略勾勒	5
三、中国史前战争实践中的间谍活动	8
第二章 夏代纷乱中的间谍实践	13
第三章 商代战争中的间谍实践	17
一、汤伐夏桀战争	19
二、商朝远征战争	22
第四章 西周时代战争中的间谍实践	23
一、武王伐纣	25
二、周公东征	27



第五章 春秋时代列国争霸中的间谍实践	29
一、齐国间谍实践	32
二、楚国间谍实践	34
三、晋国间谍实践	35
四、秦国间谍实践	37
五、郑国间谍实践	37
六、越国间谍实践	39
第六章 战国时期间谍实践	41
一、秦国间谍实践	43
二、齐国间谍实践	49
三、燕国间谍实践	51
四、赵国间谍实践	54
五、魏国间谍实践	56
六、韩国间谍实践	57
第七章 楚汉战争中的间谍实践	59
一、刘邦间取峽关	61
二、鸿门宴背后的间谍战	62
三、刘邦以间谍成汉中根据地	64
四、韩信以间“灭魏、破赵、平齐”	65
五、陈平间楚	68
六、未遂的离间谋略——项羽间信	70
第八章 西汉抗击匈奴战争中的间谍实践	71
一、敌情不辨反被敌间，巧使离间白登突围	73
二、陈豨叛乱，行间智平	75